

伐战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战争。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①

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和党的建设理论研究方面，毛泽东也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②毛泽东的著作，不仅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而且还在党的建设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成果。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健全党委制》等著作，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工作方法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正如邓小平的评价：“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③这个评价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总之，毛泽东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这份遗产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这些遗产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教授 杨凤城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本文只论及笔者认为在历史和现实中影响最大、又是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对于上述思想或方针，学者从不同角度出發，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索。本文的立意，在于宏观审视，着力于学界言说和分析不多的地方，特别是要凸显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与特定时代的互动及其历史价值。

一、关于“二为”方向

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首先绕不开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对于该方向提出的背景、内容及其意义，学界言说颇多。本文所强调的是，分析和评价这一思想需要充分关注其背后以反映论、能动论和阶级论为核心理念的革命文化观，即深层的理论支撑。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细节，尝试从宏观角度和逻辑关联上概括毛泽东所表达的文化观，大体上应包括这样几个层次和方面。

首先，“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

①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

②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612页。

③ 《完善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可以说，这段话是毛泽东关于文化本质与功能的最简洁、最明确的表达，他自己也说“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①换言之，即经济政治决定文化形态，文化对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

这种以决定论、反映论和能动论为核心理念的文化观，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同时，“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③

其次，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当然也会存在于作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领域。换言之，阶级社会的文化是有阶级性的，作为一定政治经济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政治经济的文化，实质上就是反映一定的阶级利益并反作用于一定的阶级利益实现的文化。因而，在阶级社会，作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也可以说成是作为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反映的文化。正是由此出发，毛泽东得出更为直接、明确的结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

最后，从决定论、能动论和阶级论的认识出发，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革命文化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⑤

毛泽东对革命文化之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或者说列宁的有关论述构成了毛泽东相关阐释的直接思想资源。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便要求提出“党的文学原则”，认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引用了关于“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提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⑦

从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更明确地阐述了文化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同时，毛泽东又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③ 《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9页。

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5页。

⑤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8页。

⑥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⑦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8、302页。

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①这样,文艺服从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便和为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就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毛泽东阐述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实际上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化领域,由此而言,“文艺”和“文化”作为主语是可以互换的。

综观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提出的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文化的基本观点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取舍、侧重发挥和发展,决定着 he 不能不时时凸显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这条主线,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甘冒矫枉过正或绝对化之嫌而鲜明地表达看法。从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战争实际出发,突出文化的阶级性和工具性(或用毛泽东的话讲“革命的功利主义”),以使其充分发挥为革命为战争服务的功能,可以说是毛泽东文化观的突出特征。必须承认,“二为”方向指导下的文化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配合与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二为”要求,一方面对新中国的文化转型与重建,对塑造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突出特征的新型文化,对满足普通工农大众的精神需求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强调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服从或隶属关系,过于胶着于阶级分析的视角,将意识形态考量、政治正确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因素,导致文化的政治化倾向日趋严重。“文革”结束后,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新“二为”方向,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察和评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该方针虽然直至1964年9月方正式概括出来,但作为思想原则早已经明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关于对待中外文化的正确态度的阐述,概括言之,一是立足于现实需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从中外文化的关系上讲,不能自我封闭;从古今文化的关系上讲,不能割断历史。二是要有科学精神,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又集中讲到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即“洋为中用”,且远比民主革命时期的相关论述更为展开、深入和清晰。他强调,外国的一切科学原理和长处都要学,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③可以说,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是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谈论中外文化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的立场和态度直到“文革”爆发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考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中共革命与执政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强势,毛泽东在谈到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时,还是比较侧重提醒人们对传统文化不要过分否定,提醒人们注意继承其中有价值的遗产。例如,1960年12月在接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毛泽东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855页。

② 详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

③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82页。

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①谈话表明，毛泽东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又有了更深入一层的思考。

评价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需要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文化背景，同时也要联系抗日战争需要振奋民族精神的现实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激烈的反封建文化传统和热烈拥抱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民主”与“科学”）为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文化大背景下成立的，成立后肩负起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评价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如果专就中国文化进行全面评价，情形便不同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激烈抨击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达过传统文化并非一无可取，只不过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和批判，不得不取矫枉过正的态度而已。后来，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为调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作为时代要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自然需要适当调整“五四”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态度。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新启蒙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现代民族主义启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对中国本位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探讨便很能说明问题。及至抗战全面爆发，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凝聚和鼓舞中华民族抗敌的决心和信心，自然成为一种理性选择。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1940年1月，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进一步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概括言之，中国的旧文化总体上是封建主义的，但有许多进步的、民主的因素；正确的态度是“批判的接受旧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③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共历史上，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如此明确地从宏观角度专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肯定其中的优秀因素还是首次。并且，他们所阐述的基本立场一直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延续至今。

此外，评价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还需要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同时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而导致如何看待中外文化关系成为新的重要问题这一背景；需要联系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理论上设想和追求的全新文化类型，如何看待它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类型文化的关系这一背景。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并非兴之所至，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新中国成立后，全盘照搬苏联经验和做法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把学习苏联同学习西方对立起来，且动辄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帽子做“清道夫”，这些情况毛泽东是了解的。另外，新中国建设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的关系如何，虽然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出于文化重建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否定和批判的话语强势则显而易见，将文化论争动辄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做法也并不鲜见。在“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时期，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要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西方现代文化、不能采取简单否定态度的意见，并非空穴来风。而且，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际，有的批判者断言，所谓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招魂；所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或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根本就不存在，有的只是伪科学。

①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③ 详见《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张闻天文集》（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7页；《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及至“文化大革命”，中外文化遗产几乎均成为扫荡的对象。社会主义文化似乎成了既没有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没有横向交集的凌空而起的楼阁。这一现象，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相关思想的重要性。

三、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最后，让我们考察和分析毛泽东最著名的文化建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该方针提出的背景、过程、基本内容及其意义，学界的探讨可谓浓墨重彩，毋庸再加赘述。本文仅想聚焦于学界关注不多而对于评价“双百”方针又颇为重要的问题上。

首先是关于“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学者论及较多的是具体背景，如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固确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出现了全盘照搬偏向，频繁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来思想沉闷等，而对于宏观社会与心理背景，似乎注意不够。实际上，1957年4月14日，周恩来同在京的60多位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便道出了“双百”方针出台的宏观社会背景，他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大旗竖立起来，才有可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①

此外，民主革命的辉煌业绩，执政全国之初的巨大成功，所有制改造的高歌猛进，这一系列改变中国的空前壮举，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等政治领袖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与理论的创造活力，这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心理背景。

其次是毛泽东阐述“双百”方针的时代和个人特点。综观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他在充分肯定“双百”方针符合文化发展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的大前提下，针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重点阐述了如何看待和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实行“双百”方针的关系问题。

“双百”方针提出后，引发了来自两个方面且大不相同的抵触和疑虑。一是部分党员干部忧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会因此动摇；二是部分知识分子担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会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针对上述疑虑，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回应：（一）从真理论出发阐述了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②（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一切文化成果，或者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均不允许存在。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明确讲到，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③毛泽东在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例如，针对被确定为文艺创作和批评之最高准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

① 《坚持三条原则，处理好十个关系》，《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232页。

③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06页。

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又如，文艺作品应主要写工农兵，但“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自己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呢？……但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影响他”。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要多样化为好”。^①由上述谈话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多样化文化的宽容心态。当然，更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主旋律”作品的情有独钟。

自1956年春至1957年春，毛泽东对“双百”方针除了理论上的阐释外，还十分关注来自“左”倾僵化思想的干扰，并进行严厉批评。这种干扰主要源自部分中高级党员干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便是典型。从毛泽东对该文章的批评用词之严厉——认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②——和批评频率之高来看，从毛泽东认为老干部多同情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和反复言说党内干部对“双百”方针的不理解来看，^③从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及地方党报宣传“双百”方针不及时和力度不够来看，阻力和抵触确实较明显地存在。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指出：“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可以说，从1956年春到1957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提倡和宣传最为热心真诚，力度也最大。毋庸多言，“双百”方针，符合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刘芳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1、256、80页。

②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9、253页。

③ 参见毛泽东：《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3月6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日）等，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9—250页。